

《花间集》多择录小令之原因考论

李博昊*

(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7)

摘要 《花间集》收录词作五百首,以词体形制论,几乎皆为篇幅短小的令词。考其时词体之形制发展及花间词人之创作情状,足见当时并非无中、长调,惟《花间集》不采而已。此种情况或与后蜀宫廷的审美趣尚、蜀地笺纸的流行密切相关。

关键词 《花间集》;小令;绝句;笺纸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3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6-2491(2018)01-0066-04

DOI:10.16275/j.cnki.ywxk.2018.01.013

《花间集》是中国第一部文人曲子词集,产生于乐舞风行的后蜀时期。就词体文学的形制而言,此时小令、中调、长调皆已有之,但《花间集》在编选之时,则多择小令。前人曾注意到《花间集》编纂上的此种特征,元好问即指出《花间集》“亦止小令短歌耳”^{[1] (P218)},然对于此书缘何只择令词,却未见阐释。《花间集》选录小令短歌或与唐五代以来的文学喜好、后蜀宫廷精雅的文化品尚、蜀地制笺工艺的发展及小幅笺纸的流行等因素关系密切,下文试述之。

一 《花间集》编纂之际已有长调

就唐五代时期词体文学之创作形制而言,早在敦煌曲子词中,中调、长调即已出现。如《倾杯乐·求名宦》:

忆昔笄年,未省离合,生长深闺院。闲凭着绣牀。时拈金针,拟貌舞凤飞鸾。对妆台重整娇姿面。知身貌算料。□□岂教人见。又被良媒,苦出言词相诱衍。每道说水际鸳鸯,惟指梁间双燕。被父母将儿匹配,便认多生宿姻眷。一旦聘得狂夫,攻书业抛妾求名宦。纵然选得,一时朝要,荣华争稳便。^{[2] (P124-125)}

《倾杯乐》是唐教坊曲。《明皇杂录》记唐玄宗

“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,分为部目,为某家宠,某家骄。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,上俾之教习,无不曲尽其妙。因命衣以文绣,络以金银,饰其鬃鬣,间杂珠玉。其曲谓之《倾杯乐》者数十回,奋首鼓尾,纵横应节”。^{[3] (P45)}《乐府杂录·新倾杯乐》记宣宗“喜吹芦管,自制此曲,内有数拍不均”,宣宗初捻管,令俳儿拍,不中,“上瞋目瞪视之”,俳儿“忧惧,一夕而殒”。^{[4] (P39)}此曲后演化为词调,敦煌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录此调两首,《求名宦》外,另有《五陵堪娉》均为百字以上的长调。

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又录《内家娇·应奉君王》:

丝碧罗冠。搔头坠髻。宝妆玉凤金蝉。轻轻敷粉。深深长画眉绿。雪散胸前。嫩脸红唇。眼如刀割。口似朱丹。浑身挂异种罗裳。更薰龙脑香烟。展子齿高。慵移步两足恐行难。天然有□□灵性。不娉凡间。教招事无不会。解烹水银。炼玉烧金。别尽歌篇。除非却应奉君王。时人未可趋颜。^{[2] (P138)}

《内家娇》是盛唐创调。任中敏根据《应奉君王》中“教招”一词,考证出此首及后一首《御制林钟

* [收稿日期]2017-04-18

[基金项目]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唐五代词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16CZW036)

[作者简介]李博昊(1982—),女,吉林榆树人,文学博士,副教授。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。

商内家娇·长降仙宫》均是当时宫廷乐工所写,盛赞杨贵妃,以邀人主之崇。后蜀何光远《鉴诫录》记前蜀时期宋光嗣多为戏判。“判小朝官郭廷钧进识字女子云‘进来便是宫人,状内犹言女子。应见容止可观,遂令始制文字。更遣阿母教招,恨不太真相似。且图亲近官家,直向内廷求事。’”此反映出《内家娇》首辞从初制入讲唱后,即向外流传:地由长安传至四川成都,直线距离且千五百里,不为不远;时由天宝四年(745)起,唱达王蜀(891—925),已历百八十年,亦不为不长。而此时此地其辞尤脍炙人口,朝野皆习,然后始有可能触事缘情,采其句入戏判。^{[2] [P146]}如此可见后蜀时期长调《内家娇》广泛流行,其时蜀地并非小令独领风骚。

《花间集》的姊妹书《尊前集》中亦收录了文人创制的中、长调作品。如杜牧的《八六子·洞房深》为中调,李存勖的《歌头·赏芳春》为长调。更需说明的是,《尊前集》收花间词人李珣的《中兴乐·后庭寂寂日初长》八十四字体,但《花间集》未录此首,却录毛文锡同词牌的《中兴乐·豆蔻花繁烟艳深》四十一字体。《尊前集》又录花间词人尹鹖的《何满子·云雨常陪胜会》七十三字体,《花间集》则录毛文锡的《何满子·红粉楼前月照》三十六字体。不仅如此,《尊前集》所收尹鹖的《金浮图·繁华地》《秋夜月·三秋佳节》,两首《拔棹子》之《风切切》与《单脸赋》等词作,皆非小令。此进一步表明花间词人并非未曾创制中长调,惟《花间集》在选录词作之时,有意略去此类作品,择小令短歌而已。

二 花间令词与后蜀宫廷的审美趣尚

《花间集》为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主持编纂,欧阳炯《花间集·序》言此集编纂的用意之一乃是“使西园英哲,用资羽盖之欢;南国婣娟,休唱莲舟之引”,表明《花间集》带有乐歌集的功能,其中作品乃为在酒宴之上以佐清欢。如此,集中的作品自当符合后蜀宫廷贵族的文学喜好。

后蜀后主孟昶“能文章,好博览,知兴亡,有诗才”^{[5] [P292]},前蜀主王衍“尤酷好靡丽之辞,常集艳体诗二百篇,号曰《烟花集》”^{[6] [P531]},孟昶“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,而其词自工”^{[7] [P88]},所制《洞仙歌令》中“冰肌玉骨,自清凉无汗”两句,已脱“月貌花容”之俗境,进入了“美”的另一境界。^{[8] [P348]}孟昶“好学,凡为文皆于理”^{[9] [P6093]},喜好蕴藉风流之作,小令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特征恰与之趣好相符。孟昶宠妃花蕊夫人《宫词》云“新翻酒令著词章,侍

宴初闻忆欲忙。宣使近臣传赐本,书家院里遍抄将。”展示出蜀宫宴会之时写作传唱酒令歌词的情形。

后蜀宫廷钟爱小令与自唐以来对绝句的推崇是一致的。唐人好绝句,其高难度的创作技巧使之成为文人展示才情的载体,善写绝句的诗人往往受人仰慕,其创作也谱曲入乐,广为传唱。清代人李重华言“盖唐时入乐,专用七言绝句。诗家亦往往由此得名。”^{[10] [P928]}王士禛《唐人万首绝句选序》言自开元以来,“宫掖所传,梨园弟子所歌,旗亭所唱,边将所进,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。故王之涣‘黄河远上’、王昌龄‘昭阳日影’之句,至今艳称之,而右丞‘渭城朝雨’流传尤众,好事者至谱为《阳关三叠》。他如刘禹锡、张祜诸篇,尤难指数。由是言之,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,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”^{[11] [P364]}。后蜀花蕊夫人长于诗咏,曾仿王建作宫词百首,时人多称许之。^{[6] [P824]}《宋诗钞》赞曰“清新艳丽,足夺王建、张籍之席。盖外间摹写,自多泛设,终是看人富贵语,故不若内家本色,天然刘丽也”^{[12] [P3057]}。百首宫词篇幅短小却含蓄隽永、意味深长,如李渔所言,乃“如临去秋波那一转,未有不令人销魂欲绝者也”。

绝句为唐之乐府,小令则是五代教坊新宠。作为新兴的文体样式,小令在唐五代、北宋时期尤为文士所喜。宋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四十八个词调中,小令为三十四调,占百分之七十之多。^{[13] [P108]}小令形神皆似唐人最爱的绝句,创作难度很大,艺术境界高妙。张玉田曾言“词之难于令曲,如诗之难于绝句。不过十数句,一句一字闲不得,末句最当留意,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”^{[14] [P29]},体现了最高的诗应是最单纯、最天真、最概括、最富于启示性的艺术本质。^[15]这种文学风格与境界正为孟昶所崇尚。或因如此,《花间集》在采选词体形制时,多择录新兴的词家小令,以佐酒宴清欢。

花蕊夫人《宫词》有云“才人出入每相随,笔砚将来绕曲池。能向彩笺书大字,忽防御制写新诗。”^{[16] [P47]}孟昶常制新辞,其将新作书写于彩笺,不仅展示出其文学才华,亦彰显出《花间集》多令词的另一个原因。

三 花间令词与蜀地笺纸的风行

欧阳炯《花间集·序》描绘了其时宫廷宦宦之家宴饮的情状“有绮筵公子,绣幌佳人,递叶叶之花笺,文抽丽锦。举纤纤之玉指,拍按香檀。不无清

绝之辞,用助娇娆之态。”“递叶叶之花笺”展示出宴会上通过笺纸传递词作之景致。以“叶叶”形容“花笺”,可见笺纸之小巧可人。而令词短小的形制,恰适合书写于笺纸之上,在酒宴樽前辗转送递。此正是唐人贾餗所描绘之“杯停新令举,诗动彩笺忙”。

笺乃特殊之纸品,或用单色漂染,或用套色印刷,或加以浮雕图案,或洒以金银色粉屑,赏心悦目,文人雅士往往爱不释手。^{[17] [P15]}笺纸在魏晋时已经出现,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载王羲之“为会稽令,谢公就乞笺纸。库中唯有九万枚,悉与之。”^{[18] [P210]}。谢安求如此之多的笺纸,展现出风雅之人对笺纸的喜爱,亦表明当时制笺技术已相对成熟。《初学记》引应德詹《桓玄伪事》云“玄诏令平淮作青、赤、缥、桃花纸,使极精,令速作之。”^{[18] [P210]}说明其时已有青、红、浅青、桃红等多种色纸。^①北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言“桓玄诏令平淮,作桃花笺纸,及缥绿青赤者,盖今蜀笺之制也。”^{[19] [P49]}两晋制笺的做法为唐五代积累了经验,其中蜀笺尤其是珍品。

蜀地制纸誉满寰中,益州笺纸更名扬天下。李唐时期,益州西南郊浣花溪盛产的笺纸,备受文士青睐。羊士谔曰“擲地好词凌彩笔,浣花春水腻鱼笺。”郑谷言“蒙顶茶畦千点露,浣花笺纸一溪春。”^{[17] [P15]}李商隐云“浣花笺纸桃花色,好好题词咏玉钩。”唐诗中又有“蜀笺染翰光”“浣花溪纸桃红色”“蜀川笺纸彩云初”“金碧烂光烧蜀笺”之语,表明蜀笺在文人中名倾当时。

蜀笺以“锦水桃花薛氏笺”最为风雅。“薛氏笺”因晚唐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得名。薛涛本居长安,后入蜀,“侨止百花潭”^{[20] [P243]}。其好制小诗,惜松花笺“幅大,不欲长,乃命匠人狭小之。”^{[21] [P25]}。薛氏“躬撰深红小彩笺,裁书供吟献酬贤杰,时谓之薛涛笺”^{[20] [P243]}。明朝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言“蜀

笺古已有名,至唐而后盛,至薛涛而后精。”^{[22] [P14]}“蜀中才子既以为便,后减诸笺亦如是”^{[21] [P25]}。《续博物志》载“元和中,元稹使蜀,营妓薛涛造十色笺以寄,元稹于松华纸上寄诗赠涛。”^{[23] [P137]}薛涛《寄旧诗与元微之》亦言“长教碧玉藏深处,总向红笺写自随。”薛涛曾以笺纸与元稹通书,还与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、杜牧、刘禹锡等人相唱和,薛涛笺遂名重一时,成为风雅的象征。

后蜀具备制作薛涛笺的条件。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言“四川薛涛笺,以芙蓉皮为料,入芙蓉花末汁,或当时薛涛所制,遂留名至今”,“其美在色,不在质也”。薛涛笺采芙蓉皮为原料,再将芙蓉花汁掺入纸浆,诗笺呈粉红色。^{[24] [P48,38-39]}后蜀时期,成都附近遍种芙蓉,九月间盛开,望之皆如锦绣,孟昶谓左右之人曰“自古以蜀为锦城,今日观之,真锦城也。”^{[9] [P6095]}此表明后蜀时期薛涛笺或仍盛行。后蜀宰相韦庄《乞彩笺歌》中“浣花溪上如花客,绿暗红藏人不识。留得溪头瑟瑟波,泼成纸上猩猩色”,或可为佐证。宋人喜爱蜀地的十色谢公笺,亦是在薛涛笺的基础上制造。^②然正如上引《资暇集》《蜀笺谱》所言,薛涛笺较短,“才书四韵”,《太平寰宇记》又记薛涛笺“短而狭,才容八行”^{[25] [P80]},形制的短小使之适于在宴会上传递,但在书写的词作形制上,以令词为最佳。是以赵崇祚在编纂《花间集》之时,只收录了适合笺纸形制的“小令短歌”。如此,《花间集》之“花间”,或亦带有“花笺”之意。

此外,《花间集》择录了十卷共五百首令词,为保持各卷五十首的体例,^③不惜将一人之词分置两卷。此种编纂方法前所未见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言《花间集》“惟一人之词,时割数首入前后卷,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数,则体例为古所未有耳”^{[26] [P13]}。后世很多学者认为《花间集》编纂之时体例的设计不

① 陆翻曰“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,为诏书,五色纸,着凤凰口。”后赵石虎篡位时以五色彩纸书写诏书,表明此时除单色纸外,还生产出五颜六色的多色纸。(见〔晋〕陆翻·邮中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,P1.)

② 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·纸谱》记“蜀人造十色笺”,后人称彩笺为“鸾笺”或“蛮笺”。《幼学琼林》记“韩浦以蜀笺寄其弟洎诗曰‘十样鸾笺出益州,新来寄自浣溪头’”。明代杨慎《升庵诗话》言〔宋〕韩浦诗云“十样鸾笺出益州”,《成都古今记》载其目,曰深红,曰粉红,曰杏红,曰明黄,曰深青,曰浅青,曰深绿,曰浅绿,曰铜绿,曰浅云,凡十样。又有松花、金沙、流沙、彩霞、金粉、桃花、冷金之别,即其异名。《通雅·器用》:“韩浦有‘十样鸾笺出益州’之诗,杨升庵(慎)引作十样鸾笺,元瑞讥之,不知升庵乃依《笺谱》,亦非自改也。”

③ 明汲古阁本毛晋跋《花间集》言“据陈氏云‘《花间集》十卷,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,凡五百首,’今逸其二,已不可考。”李一氓考之曰“卷第二《采莲子》,卷第八《竹枝》,皆两首混为一首,总首数确为五百首,并无逸失,毛氏刻印时未深究,致有‘今逸其二’之说。”

甚合理,遂常加改动。^①但《花间集》原有之编排方法,或与蜀笺制作之法相关。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记“蜀人造十色笺,凡十幅为一榻”,“逐幅于方版之上研之。则隐起花木麟鸾,千状万态。”笺纸制作之时似以“十”为计数单位,《花间集》每卷收词数量一致,或有此原因。此外,《蜀笺谱》记“蜀笺体重,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。”^{[20] (P244)}“番”有“张”“片”之意。《新唐书》言“况继奉天子诏和解,能无一番纸坠北路乎”。宋人高荷亦有“万金不如一番纸”之语。一夫可担负五百张笺纸是《花间集》录词作五百首的一个辅因,或亦说明《花间集》的编选与蜀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史双元. 唐五代词纪事会评[M]. 合肥: 黄山书社, 1995.
- [2] 任中敏. 敦煌歌词总编[M].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4.
- [3] [唐] 郑处海. 明皇杂录[M]. 田廷柱,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7.
- [4] [唐] 段安节. 乐府杂录[M]. 上海: 商务印书馆, 1936.
- [5] [宋] 王明清. 挥尘录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1.
- [6] [清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0.
- [7] [清] 张宗橐. 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合编[M]. 杨宝霖, 补正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8.
- [8] 夏承焘, 臧克家, 缪钺等.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[M]. 上海: 上海辞

书出版社, 2012.

- [9] [宋] 张唐英. 蜀梼杌[G]//傅璇琮. 五代史书汇编. 杭州: 杭州出版社, 2004.
- [10] [清] 丁福保. 清诗话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8.
- [11] 王运熙. 顾易生. 清代文论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0.
- [12] [清] 吴之振等. 宋诗钞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13] 王兆鹏. 唐宋词史论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0.
- [14] 罗芳洲. 词学研究[M]. 上海: 教育书店, 1947.
- [15] 葛晓音. 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——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[J]. 文学评论, 1999(01).
- [16] 徐式文. 花蕊宫词笺注[M]. 成都: 巴蜀书社, 1992.
- [17] 王稼句. 看书琐记二集[M].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8.
- [18] 唐长孺.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
- [19] [宋] 苏易简. 文房四谱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.
- [20] [元] 费著. 蜀笺谱[M]//黄宾虹, 邓实. 美术丛书三集. 上海: 神州国光社, 1936.
- [21] [唐] 李匡义. 资暇集[M]. 张秉戍, 点校.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
- [22] [明] 何宇度. 益部谈资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.
- [23] [晋] 李石. 续博物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.
- [24] 潘吉星. 中国造纸史话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8.
- [25] [宋] 乐史. 太平寰宇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.
- [26] 蒋哲伦, 杨万里. 唐宋词书录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7.

责任编辑 李剑波

① 明代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集》不袭十卷之旧,前有欧阳炯序及总目,目以人分,每家若干首,不似十卷本之强为割裂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数。(见赵尊岳.《词集提要》[J].《词学季刊》创刊·第一卷第一期,1933-04,P57.)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)玄览斋巾箱本把原来的十卷分成了十二卷。明天启四年(1624)锺人杰本依字数多少重新编排作品顺序,化十卷而为二卷。明末雪艳堂活字本把同调词排在一起,亦分两卷。由于玄览斋本、锺人杰本、雪艳堂本皆出于明万历八年(1580)茅一禎刊本,而茅一禎认同明代汲古阁毛晋本的观点,认为《花间集》选录不全,故后增录了温博的《花间集补》。从茅一禎本所出的三本不满《花间集》的本来面貌,对原本和补本都重新进行了删选。(见李一氓.《花间集校》[M]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8,P212~214.)